

# 原本识要 以实为新

——张锦池《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读后(代跋)

刘勇强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2)05-0099-03

最早拜读张锦池先生的大作是在1979年。那年,《北方论丛》因《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讨论。作为大一学生的我,第一次领略了众多学者旗帜鲜明而又不失体面风度的学术论争。现在想来,这次讨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后红学研究重新展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放在新时期整个人文学研究重新展开的大背景下看,也是值得一提的。而张先生不但直接促成了这一讨论,同时也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雄文,端居学术前沿。自那以后,张先生不断有宏篇大著问世,直至今日,老而弥坚。《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浓缩了张先生长期研治明清小说的精见卓识,不少观点久为学界所熟知和叹服。张先生很谦虚,一再说自己的著作“以求实为主,求新为辅”。这使我想到了鲁迅评论《红楼梦》的名言:“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在举世皆刻意趋时尚变的社会风气下,张先生的论著坚守古典,原名著精神之本,识佳作艺术之要,以实为新,反而表现出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格。

中国古代小说学科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草创至今,逐步发展,名家名作,多经反复讨论,经典文本研究,更是连篇累牍,令学界有“悬置名著”之叹。然而,多年来,张先生却心无旁骛,始终执着于明清小说名著,固然有他所说的出于教学的原因,却也反映了张先生的学术追求。照我的理解,名著研究虽然看似几成饱和之势,但由于经典文本实际上构成了小说史的基本座标,基于不断更新的学术背景,仍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它们作出新的诠释;二三流的作品研究也许确实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许确实是小说史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相对于经典文本来讲,对它们的研究其实往往不断印证着水涨船高之理。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小说史的叙述策略,经典文本也总会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张先生长期致力于的经典文本研究,实际上也是小说史学科的内在需要。而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典文本这一人人得而言之话题上,张先生或匡正旧说,或倡言新论,几乎对每一名著的每一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有一段颇能反映吴敬梓思想观念的对话:

当下摆齐酒肴,八位坐下小饮。季苇萧多吃了几杯,醉了,说道:“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据我说,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据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杜少卿道:“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萧柏泉道:“先

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迟衡山叹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当下吃完了酒,众人欢笑,一同辞别去了。

这段对话,刘大杰、吴组缃、吴小如等名家都有评论,其中两位吴先生更是张先生的素所敬仰的老师。诸位先生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吴敬梓的“民主主义精神”,但在《论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国”》中,张先生说,“我不敢非先生们的看法,而认为可以成为一说。”同时,又说,“我心里亦不敢是先生们的看法,而认为应该从迟衡山何以会闻之而‘叹息’上去探讨杜少卿这番议论的深层底蕴。”在张先生看来,吴敬梓所主张的还是以仁孝治天下的思想。不过,他又指出:

切莫认为吴敬梓把“以仁义服人”作为他“理想国”的最高政治纲领,并没有什么时代的新因素,只是对孔孟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旧调重弹;要知道,当时的社会虽挂孔孟的招牌,却是个“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的社会,因而《儒林外史》的思想价值,主要不是表现在它所达到的时代思想的高度上,而是表现在它以儒家原教旨思想为武器所实现的对现实社会的揭发和批判的深度上,这深度是鲜见于中国小说史的。

由此,张先生进一步认定:

《儒林外史》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基本上不是带有近代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而是中国儒学固有的朴素民主主义思想。吴敬梓及其影子人物杜少卿,基本上都是朴素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初步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中虽则不无冬末的萌芽,但至多那亦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态而已。因此,他们的缅怀先贤,主要是冀以“德治”实现“礼治”、以“礼治”完成“德治”,为其建国方略的“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而不是想披着先贤们的外衣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不厌其烦地摘引上述观点,是因为觉得这一观点不仅鞭辟入里,更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还昭示了一种认识古代小说思想性的重要方法,即不能简单地以今喻古,而应该更充分地联系古代小说创作时的传统文化语境。至于张先生所表现出的不拘成见、勇创新说的学术胆略,也是令人赞佩。

张先生之所以能在小说经典研究中提出诸多重要的见解,与他清晰独到的学术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他说,他“在解读名著时比较注意三种关系:一是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二是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三是作品与相类之作的关系。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以还原批评为基础,以接受美学作主导,亦考亦论,考论结合,尝试着将文本、文献、文化作点整合一体的研究,成了我惯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要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既需要深厚的积学,又需要敏锐的发现,还需要收放自如的阐述。以《红楼梦》为例,虽然这部小说的研究几乎达到了题无余义的地步,而张先生总能在小说思想艺术的基本特点方面,于人以为难以置词处,提出关乎全局的重要见解。如《今古未有之一人》论及贾宝玉“每日家杂学旁收”时,张先生便信手拈来章学诚《答沈枫堉论学》中的话为据,说明所谓“杂学”在当时的确所指,进而论证贾政和贾宝玉《四书》和“杂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既反映了历史上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思想斗争,也反映了现实社会新旧观念的斗争。这样的判断抑或还有进一步申论的空间,但从研究方法上看,超越表面情节描写,探究人物言行的文化动因与本质,确有发人深思的地方。虽然张先生总是围绕特定作品展开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孤立地看待每一部作品的;相反,他经常采用比较的方法,使被比较双方的特点相对而显。仍以《红楼梦》为例,在本书中,张先生便在不同场合将其与《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作了独具慧眼的精彩比较。如《论〈金瓶梅〉的审美观念》一章,张先生便从作品的描写对象、作品的艺术构思、作品行文如绘乃至读者冷热不同的阅读感受等角度,对《金瓶梅》与《红楼梦》进行了全面而富有深度的比较。这种纵横比较,互为参证,使各章勾连相通,俨然一体,具有了某种小说史的意味。

注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似乎也是张先生对许多问题共同的思想方法。比如《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在讨论取经题材演变时,张先生连用了三组“一面”如何如何、“一面”又如何如何的互补性论述,将他所说的“负债意识与感恩情结的易位”的观点,层次分明、面面俱到地推展开来。在《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之作》中,他又指出《西游记》作者真正歌颂的并不是作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而是作为斗战胜佛的孙行者。“一方面,他把自由平等观念看做天赋于人的‘童心’,讴歌具有‘童心’的‘真人’,揶揄儒释道三教混一思想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自身的合理性,认为‘童心’应接受‘常心’的一定制约,期望具有‘童心’的‘真人’去效力于‘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这种在人性与人才观念上离经而在政治观念上并不叛道的思想一以贯穿着全书,由此也就决定了作者要给他心爱的主人公孙悟空头上戴个紧箍。”在《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中,他也指出:《红楼梦》“往往一笔交织两种审美视点,一是作者的审美视点,一是时人的审美视点,二者既有重合

的一面,又有背离的一面,形成‘一声而二歌’,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认识作品的审美意蕴,以及作者的世界观所到达的时代高度。”这些两面立论、折衷求是的观点,无不是努力通过揭示古代小说所呈现的思想矛盾,准确阐明作品的复杂内涵。在不偏不倚中,自有其公允深邃的思想力度。

从本书还可以看出,张先生既拥有他那一辈学者的平实稳健,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新锐的理论思考。这种新锐的理论思考不在于使用了什么生涩的新名词、新术语,而在于坚持从小说的实际出发,发现具有普遍意义或理论深度的现象并加以新的概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之作》中,他就指出《西游记》打破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以忠奸斗争为其主要特点的二维模式,创立了比较适宜展示真实复杂人物关系的三维模式及与此相适应并互为影响的人物塑造新原则。《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中,张先生又由芳官的耳环这一细节入手,说明曹雪芹欣赏对称,但不欢喜呆板的对称,所以《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整体美是对称中有不对称,不对称中有对称的均衡美。从而提出了《红楼梦》所具有的不同于人们习称的“对称美”的“均衡美”这一重要命题,这些观点,言之有据,述之成理,都大有从小说史与艺术学加以引申充实并加以运用推广的理论空间和实践意义。

大约由张先生对本书定位于主要名著的诠释,所以除了两篇附录,没有更多地容纳他在小说考证方面的贡献。实际上,张先生在曹雪芹的生年、《红楼梦》的成书、《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及“说话”家数和故事源流、《西游记》的演变与著作权、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作过艰辛的考证,取得了值得重视或可以信从的结论。张先生的考证工作也始终是围绕名著的解读展开。针对戴不凡先生提出的《红楼梦》中存在“大宝玉”、“小宝玉”的“内证”说,张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从神态和某些行动上来说,我觉得《红楼梦》里有一个‘小宝玉’;从思想和某些言论来说,我觉得《红楼梦》里有一个‘大宝玉’。”而贾宝玉实为所谓“大宝玉”和“小宝玉”的对立统一。为此,张先生还举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等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同类形象为证。这样的分析,涉及小说写作的普遍现象与作者的用意,义理与考据兼备,比简单地考证是非更有意义。他的《〈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也是如此,张先生不只关心《水浒传》繁简本及其先后的复杂问题,他更关心文本差异所造成的思想内涵上的不同。他认为《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而有无这一描写,事关《水浒传》的宗旨:

两种悲剧放在我们面前,一是宋江接受招安以后除平了方腊以外,还平了辽,然后遇害,这是一种悲剧,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是“天下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的悲剧,是于谦式的悲剧。这是常见于中国历史的,它记录了封建当政者的无情。一是宋江谋求招安以后平了方腊,志在平虏而未能征辽,便遇害了。这是另一种悲剧,是“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剧,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是岳飞式的悲剧。其深刻性非“狡兔死,走狗烹”型的悲剧所能比拟,它旨在引起人们对北宋何以亡于金、南宋何以亡于元的反思,可谓深刻无比!

也许“征辽”描写的有无从水浒故事演变与版本传承的角度来说,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有必要作更深入的考察,而张先生将这种演变与传承与小说宗旨联系起来思路,出入文史,考论结合,无疑是这种考察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拜读张先生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常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书中充满了深刻的艺术感悟与睿智的思想火花,如本书《论〈金瓶梅〉的结构形态》一章,他指出《金瓶梅》的结构“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在《说兰陵笑笑生笔端的“理想国”》中指出,《金瓶梅》“以‘悌’起,以‘孝’结”。《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质》中,他指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皆以“天良”为塑造人物的尺度,但两部小说所说的“天良”在内涵上却是有区别的,“《儒林外史》所否定的人物是《红楼梦》要否定的,但《儒林外史》所歌颂的人物,却正是《红楼梦》要批判的。”“《儒林外史》总是向着上一代,对老年人有好感,《红楼梦》总是向着下一代,对年青人有好感。这不只是个孝悌观念的浓淡问题,也是两位作者不同‘天良’说之真切的反映。”《今古未有之一人》中,他又指出,“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示爱情时曾两次自比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做柳梦梅。原因何在呢?照我看,就在于:在爱情生活问题上张生的主动性甚于柳梦梅,在仕途经济问题上柳梦梅则远比张生热切。”诸如此类的妙语神解,恰如散金碎玉,举不胜举。我并不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我相信它们都是极富启发性的。实际上,对于永远也说不尽的经典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提供一种颠扑不破的解释或定论,而是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方法甚至激情,我以为这正是张先生不懈追求的目标,也应是阅读本书的着眼点。

[责任编辑:郑红翠]